



# 傅东育 让类型剧闪耀现实光芒

记者 张洁



傅东育

著名电视剧导演、编剧。1968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曾执导电视剧《生死卧底》《金牌律师》《破冰行动》《冰雨火》《风吹半夏》《以法之名》等。

电视剧《以法之名》播出后，因题材特殊、剧情高能、大胆敢拍而迅速“出圈”。该剧将镜头对准司法系统内部，抽丝剥茧般展现出检察官“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艰难过程，被观众称为“年度狼剧”。

从《生死卧底》的缉毒暗战到《破冰行动》的雷霆扫毒，从《冰雨火》的黑白博弈到《以法之名》的正义锋芒，导演傅东育始终深耕类型化涉案剧的沃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有人这样评价他过往的这些作品：“既有类型剧的痛快淋漓，又带着现实主义的粗粝感。”

然而，当“检察侦查”这一命题摆在傅东育面前时，这位类型剧高手却选择了一场“反类型”的冒险——没有枪林弹雨、拳拳到肉，而是以庭审辩论为刀、以心理博弈为刃，在严谨的司法框架内，刻画出人性的幽微之光。他坦言，这部戏难在“让观众看懂”。

**首度展示检察侦查  
剧本创作历时三年**

作为一部首度聚焦检察侦查工作的剧集，在优酷平台播出的《以法之名》，以“刀刃向内”的视角，突破了传统涉案剧的框架。最初，虎鲸文娱敦淇工作室总经理敦淇带着一个扫黑除恶恶题材的项目找到傅东育导演。而在傅东育看来，在《扫黑风暴》《狂飙》等剧集火爆之后，观众已进入审美疲劳期，尽管有真实案例作为依托，但题材还是缺乏新意，人物形象也不那么鲜明。他向敦淇提出：能否找到一个全新的视角？

恰在此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决定要拍一部关于“检察侦查”的电视剧。傅东育对这个概念一无所知，最高检影视中心副主任彭诚的一席话给了他启发：“在扫黑除恶工作中有一个原则，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正是检察侦查部门的重任，这与单纯的扫黑行动有所区别。”

**引导演员激发灵感  
向法律工作者致敬**

谈及对涉案剧的情有独钟，傅东育说：“涉案剧最大的特点是，在极致的戏剧冲突下，人被逼到绝境，人性的光芒才会得以展现。这是艺术作品天然的魅力，也是这类题材给予创作者的机会。”

他曾执导《生死卧底》《破冰行动》《冰雨火》等多部涉案剧，但《以法之名》与前作有着明显差异。他说：“以往我的作品多聚焦公安

**类型化结合现实主义  
创作出有温度的故事**

张洁

后来“伞”的概念也出现在海报中。

最高检不仅是《以法之名》的发起者，更是深度参与者。采访线索与案例均由最高检精心梳理并提供。从人物设定、人物之间关系的管理架构，到大纲、剧本，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双方共同的反复研讨与打磨。

这部36集的剧集以检察官日常与疑案侦破为核心，通过三位主角重启尘封案件的视角，层层拨开线索迷雾，意外挖出司法系统内更深层的贪腐黑幕。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直面人性与权力的双重考验，最终携手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拍完《风吹半夏》之后，傅东育全身心投入《以法之名》的创作，从选题确定到完成剧本，经历了长达三年的时光。这期间，创作团队奔赴四个省、十几个城市，采访了多位检察官，查阅了大量卷宗。检察侦查领域对公众与创作者而言都属于陌生地带，创作团队被扫黑除恶行动中暴露出来的系统性职务犯罪链条触动，而一线检察官“刀刃向内”、捍卫司法的职业坚守，更让人深刻感受到其特殊价值。

“过程非常艰辛，因为它是从零开始。这是一部原创作品，完全没有故事的核心，编剧团队不断调整思路，反复推敲，建立人设，建立人物关系，建立所有庞杂的一切，逐渐才形成了完整的剧本。”即便现在回忆起来，傅东育的内心仍然有点儿忐忑，“电视剧总要面对观众，无论结果怎样，都要扛下来，这是导演的责任。说我尽心了，就不在意结果，我做不到，我想任何导演也做不到。”

在《以法之名》中，“非法取证排除”“检察机关侦查权”等情节的设置，都参考了真实案例，最高检全程指导，被法律博主誉为“普法天花板”。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剧中充斥着法律术语，较为难懂。对此傅东育解释说：“《以法之名》与以往的公安题材电视剧有所不同，它更偏文、偏心理，是一种斗智，逻辑性强，动作戏较少，所以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门槛，需要有看下去的耐心。”

为什么不走寻常路呢？傅东育有自己的谋划：“我觉得，演员表演分寸的拿捏、剧情中的悬念设计，都是一部电视剧能否成功的关键。要让观众被一个个悬念勾着往下看，不断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新发现。我们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再到后期剪辑，都花了很多的心思，希望不断制造反转，也让观众参与进来，不仅仅是看热闹，还要有身处其中的感觉，这样才能让我们这部电视剧触动人心。”

**引导演员激发灵感  
向法律工作者致敬**

谈及对涉案剧的情有独钟，傅东育说：“涉案剧最大的特点是，在极致的戏剧冲突下，人被逼到绝境，人性的光芒才会得以展现。这是艺术作品天然的魅力，也是这类题材给予创作者的机会。”

他曾执导《生死卧底》《破冰行动》《冰雨火》等多部涉案剧，但《以法之名》与前作有着明显差异。他说：“以往我的作品多聚焦公安

行动，强调动作与现场感，警察直接冲锋在案件侦破一线；《以法之名》则转向了检察工作，如何依靠庭审辩论与审讯交锋的台词，营造出涉案特有的悬疑氛围与紧张节奏，是我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张译、李光洁与蒋欣三人组合，对戏时相互激发灵感，产生的能量远非单人表演简单相加可比，为剧情添彩颇多。在创作过程中，傅东育对演员的选择与角色的塑造有着独到见解。“选择演员的过程，更像是一场化学组合实验。当我将这些演员的照片贴在墙上时，我思考的是，他们能否产生1+1>2的效果，他们之间的对比色，能否碰撞出火花，为观众带来丰富的信息量？这种信息量不仅仅是演员个人魅力的展现，更是他们之间相互帮衬、共同构建故事的力量。”

《以法之名》不仅仅是对司法公正正义的呈现，更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傅东育认为，演员应该关注角色的内心世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台词、形体的表演。因此，他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有能力去探索和展现角色心理变化的演员。

如何让演员在剧中绽放光彩，是傅东育不断探索与实践的方向。他举例说：“张译，无疑是最适合穿制服的演员人选之一，他的制服形象深入人心，但是我也理解他想要挑战更多类型角色的愿望。我们鼓励演员突破自我，同时也要珍惜并发挥他们在特定类型角色上的优势。面对网络上的评价和内心的抵抗，演员不应该轻易放弃自己的特色，而是要通过努力，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有网友评价这部剧集：“没有脸谱化的反派，连小官僚的庸庸碌碌都演得令人窒息。”在傅东育看来，这正是导演的重要工作之一：确保剧组中所有演员达到相对统一的水准线。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答案是：“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还原最真实的角色状态。”

定妆、定型的过程中，傅东育强调演员要有气质感。“演员不应该只注重外表，而应该自然地呈现角色内心的情感和气质。当他们穿上制服的那一刻，我能感受到他们是否已经将角色的灵魂附体。如果他们已经融入了角色，那么剩下的工作就相对轻松了。”

通过演员的角色塑造，《以法之名》也挖掘出了在中国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法律工作者的内心情感变化。傅东育说：“我们的法治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一代又一代的法律工作者，也是执法的践行者，他们也有内心的拉扯、纠结，在那个位置上，其实很孤独。”这也是傅东育想通过电视剧表达出来的一种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想以这部作品向中国法治进程深情致敬，也对每一个在岗位上坚守梦想的人给予鼓舞与激励。

**类型化结合现实主义  
创作出有温度的故事**

在影视剧中，类型化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受众基础，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傅东育在类型化创作领域有着丰富经验和深刻见解。他说：“类型化作品，往往被贴上

了‘套路’‘公式’的标签，但在我看来，这只是表象。这类作品之所以能长期持续地吸引观众，正是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故事模式之上，这些模式经过时间的沉淀，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文化共识。关键在于，如何在遵循类型规律的同时，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和深度。”

傅东育对光影与摄制手法的严苛要求，在业内也众所周知。他认为，每一个镜头的光影、剪辑的节奏、音乐的烘托，都是为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以及类型化特质服务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涉案剧，无论其具体题材是公安还是检察，都承载着悬疑、惊悚与动作性等固有元素，构成了类型化框架，也决定了其整体基调偏向于深沉与紧张，观众对此类题材也有同样的期待与认知。”

在他看来，类型化创作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求创作者在尊重类型特征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的创新与突破。“每个案件背后都藏着不同的人性故事和社会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深层次的内容，巧妙地与类型化框架结合，让观众在享受紧张刺激的同时，感受到人性的温度和社会的深度。”

傅东育强调角色塑造与情节设置的重要性。首先来说，角色承载着作品的灵魂，他希望通过细腻的刻画，让每一个角色都变得立体起来，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动机。其次，在情节设置上，既要遵循类型化的基本规律，符合逻辑，又要敢于打破常规，设置转折。将这些做到位，观众才能在角色身上找到共鸣，对剧情保持高度兴趣和好奇心，感受到作品的魅力所在。



电视剧《以法之名》海报

另外，在创作过程中，摄影的构图、灯光的布置、美术的设计、造型的打造、剪辑的节奏把控以及音乐的氛围营造，都会紧密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呈现类型化特质而展开，最终的指向就是观众。

谈及类型化影视作品的未来，傅东育说：“随着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的多元化，类型化作品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升级。我们要去尝试新的主题、新的视角、新的表现形式，也要注重作品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让类型化作品不仅要具有娱乐性，同时更要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类型化不是枷锁，而是起点，关键在于如何用它讲好一个有灵魂的故事。”

傅东育对影视剧的市场前景充满信心，对自己的创作也始终保持着热情。“作为创作者，我们应该不断地深入生活、贴近现实，用心去感受、去思考、去体会。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作品，才能赢得观众的喜爱与认可。坚持深耕品质与本土情怀，影视行业的未来必将更加广阔。”

**傅东育访谈**  
**长剧短剧并行不悖  
受众群体各不相同**

记者：当下影视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长剧与短剧之争，您怎么看？

傅东育：长剧与短剧是两条并行不悖的赛道，各自拥有独特的生命力与受众群体。长剧的魅力在于其深厚的内容底蕴与精良的制作，关键是我们能否持续输出有品质、能触动人心的作品。这是长剧的立身之本，也是我们在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优势。长剧与短剧并非零和博弈，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长剧有其独特的叙事节奏与深度挖掘的优势，而短剧则以其轻快便捷的特点吸引着另外一批观众。如何提升长剧的质量，使其更加符合观众的审美与期待，是我们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剧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记者：作为资深导演，对于影视行业的发展您有何建议？

傅东育：我们需要精准把握市场需求，避免因过度生产造成浪费。有限的资本应该投入到观众真正需要、真正喜欢的作品上。另外，我们要坚守本土情感的表达，让每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深深扎根于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土壤之中。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点，我们的影视作品才能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记者：您接下来有什么新作品和观众见面？

傅东育：新剧《多喜一家人》根据“晋江文学城”网站潜力作家荷风吹的同名小说改编，是一部集喜剧、闹剧于一体的家庭剧，但是在欢笑之余，也能触动人心，让人流泪。这部作品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类型，它更像对中国人性社会和家庭伦理的一次深刻剖析与批判性继承。它让我想起我之前拍的一部电视剧《风吹半夏》，那种在大时代的动荡下，中国人家庭观、伦理观、秩序观被打破和撕裂的痛感。不同之处在于，《多喜一家人》在展现这种痛楚的同时，也试图证明：无论外界如何冲撞，那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缘亲情始终是我们的魂，是我们永远不会散掉的根基。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在笑完之后，感受到家庭的力量，理解到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家的温暖和支持也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记者：作为男性导演，拍摄《多喜一家人》这样一部由女性作家创作、主要针对女性读者群体的作品，您觉得有哪些难度？

傅东育：也许大家认为我更擅长执导涉案剧、类型剧。这一类剧集的核心在于其逻辑的严密性，无论是人物行为还是事件发展，都必须严丝合缝，形成闭环。观众是敏锐的，一旦发现漏洞，就会质疑作品的真实性，甚至觉得故事是瞎编的。因此，我们在铺垫情节时既要简洁明了，又要确保节奏紧凑，避免冗长。而《多喜一家人》这样的家庭剧，在我看，就要从日常生活出发，触碰到大众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部分情感。尽管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但总有一些情感和底层逻辑是共通的。家庭剧不仅仅是讲述家长里短，更是对中国人性生活变迁的一次深刻挖掘。我们想要展现出中国人面对困境时，在家庭的温暖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实现了社会的进步。这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引发包括男性观众在内的广大观众的思考和共鸣。

(图片由傅东育提供)

## 讲述

### 为津派文化研究尽职尽责 怀念张春生先生

文 穆森

张春生1945年出生，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于2025年6月26日病逝。他长期致力于津派文化研究，著有《长短集·张春生文论选》《自渡集·张春生文论选续集》《天津随谈》等，参与编纂《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津卷》等。他的很多观点值得我们继续讨论。

**梳理海河两岸文脉  
感悟都市百态人生**

张春生将自己人生最后一部著作命名为《天津随谈》。2023年，当我与我谈及要出版此书时，我只是随口建议：“可在扉页上写一句‘献给天津设卫得名619周年’，以表达一位本土学者对天津文化的深情眷恋！”没过多久，他将样书的封面图片发给我，左上角印着两行字，上行为“解读沽上文化，追寻津门今昔”，下行为“献给天津建城日——1404.12.23”。这便是我所熟识的春生先生，认真负责，言必有物，行必有果。

张春生是恢复高考后河南大学

招收的首届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写得一手好文章，尤以文艺评论见长。这是他从事天津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他亦在《天津随谈》中坦言：“这不是一部全面阐释和梳理津沽文化的读物。它只是笔者长期进行小说批评时，因为多着墨于天津作家作品，便逐步涉及天津风貌、沽上遗迹、海河文踪、市井倩影、非遗表现，以及津门的文学与影视创作。”

斯人已逝，如何评价其人其学？从他所学专业，到长期供职于天津社会科学院，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经历定位，可称其为文学研究专家、文艺评论家。然而，这显然不足以涵盖他后半生治学中以天津文化为脉络的主线。

那么，他又是如何推进这条主线工作的呢？在解释书名中的“随谈”时，他说，此非随意，“而是随时关注海河两岸的文脉，随时感悟都市百态的人生，以便体味其不凡的演进履历和闪光实绩”。他对天津文化的研究是动态且多维度的，没有局限在文学、历史中，而是更侧重对天津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进行解析，从而凸显并构建一种美学价值的表达。

了解一位学者，需从他的著述入

手。张春生的学术生涯中，《天津随谈》应是其天津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兼有学术自传性质。该书完整记录了他从文学研究中走出来，走向天津文化研究的历程，集中展现了他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表达方式等。

他认为天津文化是多彩的，城市是鲜活的，文脉是环境与人文的高度叠加。他强调环境与文化形态的关系，将天津文脉概括为四条文化带：远古文化带、明清文化带、近代百年文化带、当代发展文化带；三个文化特征：地貌促成河海通津、中心区的凝聚带动、商埠市井的雅俗影响；三个意蕴结构：积淀、置变、递进、城市、迎变、文化、机遇、创业、市风等。他通过这些维度来阐释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时空关系和价值，将保护名城与传承文脉互为表里。

**挖掘非遗的内核  
为天津城市重生**

“有非遗的日子真好！”张春生的文化生态观和美学观，还体现在对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上。他认为：非遗的主体是“人与实践”，关键在“这个环境里的这个人”在较长传续

过程中能生产成果的行为。因此，人文是非遗价值的核心，活态传承是非遗保护的核心，技艺中要注入人文，是“人文环境在选择你”。

作为市非遗的评审专家，他将天津非遗的特征归纳为：通俗性、真切性、独特性和趣味性，具体表现为饮食制作讲究河海食材、手工技艺追求俗中致雅、艺术表演推崇风格独具、医药炮制提倡精研细作、传统节庆富有向心意蕴。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但凡身体状况允许，参加的社会活动大多与非遗密切相关。他的女儿张丽卉告诉我：“谈到非遗，父亲的眼睛里有喜悦！”在他的告别仪式上，有很多非遗传承人自发前来送别“张老师”。

结识春生先生十八载，虽无长期共事的经历，但平日里，我们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却多有交集。也正是从这些交往中，我看到了他的学风端正，有态度，有见地。《天津随谈》将“珍惜、佑护、敬重天津文脉”作为书中专节论述，并贯穿全书，视其为维护文化生态的必要手段。

身为学者，凭借研究成果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成为他后半生重要的社会责任。担任过文学研究所所长，连任三届市政协委员（其中两届为常委，还曾任文史委副主任），受聘为市文史研究馆员的这些履历，为他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平台，也拓展了学术视野。我曾向他女儿建议，要整理他在政协履职期间的提案，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他对天津文化建设的所思所为，以及学以致用学风的形成。

我们首次合作可追溯至2008年。我邀请《人民政协报》记者来津采访，写一篇关于五大道保护的新闻

稿，一同接受采访的有陈雍、张春生、张利民、徐苏斌等专家。张春生从完善名城保护专家咨询制度的角度发表了观点。由此，我知他对保护不仅有情怀，还有研究，更能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遗憾的是，那篇稿件未能发表。

2018年12月23日，为给天津城市生庆，推动设立天津的“历史文化名城日”，我发起召开了“历史文化名城座谈会”。张春生在会上提出：要通过梳理城市文化脉络全面认识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性，建议彰显城市文脉还需有符号建设，并回顾了自己在政协的提案，希望在解放桥头立碑展示天津城市历史，在团泊洼立碑纪念郭小川。

**关注马家店遗址  
热心博物馆建设**

因为我们热爱这座城市，尽管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心之所向是一致的。2019年是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位于红桥区铃铛阁历史地段的马家店遗址，是1899年王襄、孟广慧鉴定、购买殷甲骨文的地方，是甲骨文发现辨识的重要纪念地和坐标点。那些年，几经周折，尤其是在权威专家宿白、谢辰生、徐苹芳、黄景略、张忠培的一致认可和大力推动下，马家店遗址终于在2010年纳入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被正式认定为文物。

为了保护好马家店遗址，我于2020年3月联合陈雍、张玉坤、张春生、任吉东，提出《关于依托马家店遗址筹建天津甲骨文发现地纪念馆的建议》，呼吁